

公共管理丛书

袁宝华题

共同富裕

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

GONGTONGFUYU
常兴华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济研究所重点研究项目

共同富裕

——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责任设计: 孙长福

责任印制: 孙长福 王国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同富裕: 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常兴华著.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4. 3

(公共管理丛书)

ISBN 7-5084-1937-5

I. 共… II. 常… III. 收入分配-研究-中国 IV. F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2006 号

书 名	共同富裕
作 者	常兴华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三里河路 6 号 100044) 网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waterpub.com.cn 电话: (010) 63202266 (总机)、68331835 (营销中心)
经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北京安锐思技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丰源印刷厂
规 格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16 印张 22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2004 年 4 月第一版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完善公共管理艺术 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为公共管理丛书出版而作

现代公共管理是近年的一个热门课题，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协商、沟通、对话的活动贯穿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公共事务工作之中。可以说，现代公共管理就是协商沟通对话的管理。在公共领域的得与失，基本上都是协商、沟通、对话是否通畅和到位的反映。现代行政领导面临的是一个公共管理的新时代。这一时代对行政领导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工作需要大量地运用现代管理手段来完成。不仅政府与公民、企业和社会团体间的许多关系要依靠公共管理来协调和解决，而且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的许多关系也要借助于公共管理得到调整和改善。

公共管理需要行使公共权力。政府是权力核心。除了政府，非盈利组织和企业也有公共管理问题。企业运营中经常会涉及社区管理、政策评估、人力资源开发等公共管理内容。非盈利性组织如残疾人联合会、红十字会、消费者协会、中华体育总会、轻工业协会、纺织协会等，本身就属于公共管理组织。公共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市场化，也要求各级领导尽快学会运用沟通手段和掌握谈判艺术，要努力提高管理者的公共管理能力和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的能力。例如，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在电、气、煤、水、通信等各服务领域的供给方面需要引进竞争机制，加强公私合作和合同管理。公私合作和合同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由一系列公共管理组合而成。

在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改革、提高公民参与的改革，也不断要求有关领导学会通过公共咨询等各种管理方

式调整政策方案和进行科学决策。例如加速转型期的社会发展、加入WTO后的政策调整、提高消费品价格、城市交通规划等问题，实际上是各种利益团体同有关政府部门的协调管理问题，可以采取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走访等多种方式得到更加妥善的处理。对垄断性行业如何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管制制度，主要包括完善管制立法、建立规范的管制机构、构建新的管制机构体系、出台新的管制办法及重塑管制对象，也都需要各方面的有效沟通。

新公共管理体制和制度的推行都要求有关部门的公务人员学习新的管理思想，习惯新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学会通过公共管理来改进政策的制定与公共监督，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管理活动将行政部门带进与服务、管理对象共同决策的舞台。如果说公共管理活动也属于行政管理活动的范畴，那么公开对话的大量出现，将促使行政管理关系乃至传统行政管理的概念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逐渐改变行政领导的传统管理观念，促使领导者更多地关心如何满足双方利益和进行共同决策。领导管理活动给传统的行政管理带来了民主和平等的新风气，它将使公共行政发生更加重视民主参与的实质性的变革。另一方面意味着行政活动增加了新的职能。不同行政部门发生纠纷时，过去主要依靠上级领导出面解决，现在更多地要通过管理途径来同对方协调。在协调同外部关系的过程中，管理活动赋予行政领导以新的职能。行政领导不仅要善于运用管理手段处理同对方的关系，而且要善于运用管理手段更广泛地处理和开发同外部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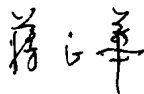
公共管理是个大题目，涉及面广，难度大，它涉及到人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1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奇迹的时代，也是一个公共管理精英辈出的新时代。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各行各业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加剧了我国社会变革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企业，都迎来了数不清大大小小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都必须认真进行思考，勇于创新，开拓前进，确定正确的发展道路和策略。

经过 25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各部门结合行业的特点，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精神、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很好地融入到各行业的发展规划、各部门的政策完善和规划、政策的实施中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不断完善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随着企业边界的模糊，等级制度的弱化，传统顾客的品牌忠诚度的变动以及其他种种全新景象的出现，必须用改革、发展、创新的思维来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努力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这是我国未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和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管理工作新课题。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组织学者编写了一套“公共管理丛书”并邀我作序，我欣然接受。出版社精心策划这套选题并全力以赴地投入，绝非是偶然的事情。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向读者推出的这套系列图书，对于提高读者的公共管理意识，特别是对于提高政府或非盈利组织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领导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编辑出版这套“公共管理丛书”，将弥补公共管理研究方面的不足，对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套“公共管理丛书”主要是从我国各类学术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和国家权威部门重点研究课题成果中筛选确定的。它以思想性、理论性、实用性为特点，积极探寻公共管理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因此我相信，各领域的读者定可从这套丛书中学到许多公共管理的知识，并感悟出更多的领导者应当具备的管理方法和领导艺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03 年 11 月 1 日于北京

丛书主编的话

记得董克用教授刚刚就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曾经与我们抱怨地说：“中国目前关于公共管理的案例很少，能够讲好MPA学位课程的老师更少！”。杨宜勇说：“其实，各部委的一些司长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他们知道很多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执行过程面临的问题，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他们只能讲一个两个专题。”从那时起，我们就产生了主编一套公共管理教学与研究参考资料的想法。首先，有利于公共管理专业老师的备课，增加讲课的深度和生动性；其次，有利于公共管理专业学士生和硕士生为撰写学位论文查阅参考资料；第三，有利于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发展脉络和趋势。现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个计划。这套丛书的出版，应该是“官”、“学”、“研”和“出”四结合的产物。

也许，我们真的与公共管理有冥冥之中的缘分。1994年，杨宜勇作为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推荐和欧盟选拔的访问学者，先是在欧洲公共管理研究所（荷兰）研究宏观调控。欧洲公共管理研究所坐落在荷兰最南部的世界历史名城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市，著名的欧洲共同体（现欧盟）条约的诞生地。马斯特里赫特市是荷兰最早的一个在古罗马时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市，代表着欧洲文明的昨天和今天。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荷兰、德国、比利时三国的文化在这里交融，这样马斯特里赫特市就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中心。因此，欧洲公共管理研究所可以说是设在一个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接着，他又去欧洲学院（比利时）研究社会保障，并且是这所欧盟公务员学校的第一个中国访问学者。在这里他感到最惊讶的是MBA只要读9个月。欧洲学院坐落在欧洲历史名城布鲁日（Brugge）。据史书记载，布鲁日公元9世纪建城，14世纪时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商港，在这里研修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公共管理的古老和尊贵。第二年，他又去了美

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研究计划生育的投资效果，与此同时，他还认识了许多研究能源、环境和媒体的学者。在对外交流之中，他有许多学术之外的感触：一是在欧盟，劳动力可以在主权国家之间自由流动，而当时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还要“路条”。欧盟还有一笔数目非常可观的地区发展基金，协调和促进各国落后地区的发展。这些说明中国的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二是在美国，像东西方研究中心这样的NGO，坐落在太平洋的一个大岛上，它们的目标是希望把东方和西方联结起来，缩小南北差距，门口的那条东西方路就是因为这个NGO命名的。这说明公共管理的范畴很大，不仅局限于政府部门。这些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1988年，黄燕芬参加了美国非政府组织——福特基金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硕士课程班。1998年，她又开始在德国埃森大学攻读货币政策的博士学位的五年求学生涯；后来通过在德意志银行研究部的实习，也使她从一个侧面和多个侧面了解了德国公共管理的情况。埃森大学位于鲁尔区(Ruhrgebiet)，埃森(Essen)是以前的大兵工厂克虏伯所在城市。鲁尔区原本以生产煤和钢铁为主，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先后遭遇“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鲁尔区的传统产业结构被迫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传统产业结构成功转换的典范。在那里，黄燕芬也经常参与接待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考察团，向他们介绍德国政府在鲁尔区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回国后，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我们这次推出的这套“公共管理丛书”，得到了许多政府部门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支持和帮助，这些朋友的名字都已列在了顾问和编委会中。这套丛书计划每年推出一批，因此我们衷心地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提出宝贵意见和改进建议，以帮助我们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我们的联系方式：yangyiyong@21cn.com, huangyanfen@hotmail.com

杨宜勇 黄燕芬

2003年10月23日于北京

序 一

陈东琪

如何看待收入差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富人说：有差距好，没有差距怎么会有竞争，怎么会有积极性和效率呢？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没有收入差距的市场经济。

穷人说：不行，差距扩大直接危害我们的利益，况且在目前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下，你富人收入积聚的一部分是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的呀！

政府决策者说：改革以前，我们尝到了平均主义的苦头，要追求效率和增长目标，看来存在收入差距是必然的。但从低收入者利益、社会稳定和通过增加大众消费来扩大内需的需要来看，还要努力做到公平。经济发展既要效率，又要公平。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关系，建立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均衡分配制度。

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发表了不少意见，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论著，中国近20多年来也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读者看到的《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一书，以更为实证的研究方式，深化了人们对收入差距这一“哥德巴赫猜想”式问题的认识。

几周前，常兴华同志要我为《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

入差距》一书写个序。对收入差距这个几乎是老生常谈的题目，要说的话很多，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在这个短“序”里，我只想谈点简单想法。

效率是经济的命脉，是发展的源泉，一个没有效率的经济最终是要消亡的。

以“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在原苏联、东欧、中国分别实践了几十年后又改革掉，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主要原因是效率低下。为什么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并在辛辛苦苦建设了几十年后又要花很大代价进行改革，最终再次回到市场经济呢？关键是计划经济没有竞争，没有差别，劳多劳少，报酬一样，有能力的人没有积极性，靠动员和宣传不能保证积极性和效率的持续性。在这个没有差别的旧体制下，所有国民都很辛苦，但一年到头还是吃不饱，国家也一直解决不了落后和贫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人，经济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我们只用了差不多 20 年的时间，就使 13 亿人口实现了总体小康，使国家实力很快上升到世界第四位。这靠的是什​​么？是市场，是竞争，是有差别的竞争，是“先富”政策对这种差别和竞争的推动。

从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看，要搞市场经济，要使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趋势，没有收入差距是不可能的，平均主义只能是让大家都穷下去。

但是，保持有效率的收入差距要有一个社会容忍限度，或者叫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其实，从人性观点看，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或多或少地存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大家都希望社会公平，希望你的财富可以比我多但不能多得离谱。

上个月，我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证监会主席的年薪拿到 1 亿多美元，老百姓有意见，他后来不得不辞职了。

有能力的人，作贡献大的人，按照等量贡献获取等量报酬的原则多拿收入，多占有社会财富，人们一般都能接受。因为，如果作贡献

多的人和作贡献少的人拿一样的报酬，对贡献多的人事实上也是不公平的。

但是，在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果收入差距大得离谱，大得不合理，大得超过了人们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的容忍限度，违犯了等量贡献获取等量报酬的原则，这个“差距”就是不能接受的。

进一步说，如果收入差距超过了合理的、社会能够容忍的限度，也会牺牲效率，因为由于不合理差距造成的低收入者，特别是因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缺陷而产生的贫困者，他们从心理上是不能接受这个“差距”的，不愿意真正为社会贡献他的全部智慧和技能。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能力浪费，是一个巨大的效率损失。

比如，有的人之所以收入高，成为富裕者，不是因为他作出的贡献（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知识和其他形式的贡献）大，而是因为他的权力大，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官权、行业垄断权等）多。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低的人是不能容忍的。

这样看来，一个社会里人们之间形成的收入差距，既要有一个度，不能太大，又要产生于合理的原因。就是说，现实的“差距”要以机会均等为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社会的基础是机会均等，是人人都有条件和机会成为“差距”中的高收入者，都有机会成为富人。只有在这样一个公平社会里，我们才能够看到人人都努力工作的景象，才能够看到“差距的和谐”，才能够看到社会经济运行总是处于高效而又稳定之中。

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团体，因其制度、文化、传统、习惯和各种环境因素的差异，人们对“差距”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大家对“机会均等”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基尼系数尽管不同，但都能够运转下去的缘故。由于这一点，就使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在寻找适合本国的“差距的和谐”时，有一个较大的选择空间。

常兴华同志在《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中，

针对中国最近几年来的具体情况，对上述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些分析，不但对收入分配理论有系统的理解，甚至对诸如基尼系数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的认识，也都非常有见解，而且作者掌握了大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际资料，有的是他们直接调研获得的数据。这就使得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他们提供的成果中，也显得很有新意，既有知识性，又有可操作性。

同时，我也从这份富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中，深刻感觉到作者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良知，对“公平和效率和谐”的追求。因此，作为读者，作为对社会弱势群体特别关注的经济学家，我要特别感谢作者及有关的研究者。我想，对我们这样一个到处都充满着财富渴望和冲动的国家来说，需要有一些具有良知而又冷静的专家学者，需要有一些拥有人智慧而又讲究操作策略的决策者，来为社会的和谐作出贡献。

2003年10月22日

于北京木樨地国宏大厦

（陈东琪，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序 二



常兴华学弟 1993 年 7 月 11 日来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工作，当时我是收入分配研究所的负责人。从此，我们一起做了不少收入分配方面的课题研究工作。

他是一个有想法而不喜欢张扬的人，喜欢默默地耕耘。这些年他取得了不少成果。现在出版的《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就是以他主持的项目之一为基础写成的。邀我作序，乐而为之。

目前，全国上下正在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在这个期间，我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讲话又认真地翻阅了一遍，并且有一些新的收获，与大家共享。

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意这里他使用的是“允许”，是当时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重要突破点，其实在我看来“允许”用词是最准确的。在这里他还强调了“允许”的示范作用，希望富裕的生活能够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同志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希望加快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心情。他在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去4年多了，形势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也表达了对这方面推进工作的不满意，特别是城市的问题更多。所以对当时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强调：“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有关部门不要阻拦，要顺应潮流，维护制度创新。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这时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提倡“先富”还有一定的思想障碍。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强调：“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只要措施配套，不应该导致两极分化，我们根本上就不希望出现两极分化，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中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这应该说是邓小平同志搞改革始终坚持的一条原则。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总的说来，除了个别例外，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指出只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对一些消极的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就可以保证实现共同富裕。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强调：“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同志这段讲话与1985年9月23日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进一步指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拿事实来说话》）这里，邓小平同志用了一个“让”字，我理解这个“让”字实际上还是“允许”的意思，不是有些人解释的“让谁富谁就富，不让谁富谁就不可能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就是为了彻底打破平均主义，实现共同富裕。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指出：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江泽民同志接着说：“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社会保障的标准和水平。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里，江泽民同志的表述更加全面：“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手段更加明确，要求更加具体。与此同时，还强调了完善社会保障的重要作用。

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指出：“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胡锦涛同志接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群众利益无小事。凡